

楚文化与漆器研究

陈振裕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陈振裕先生撰写的关于楚文化与漆器方面的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51 篇,主要包括综论、楚文化研究、秦汉考古与文化、漆器研究、音乐考古、农业考古和其他七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楚文化研究、漆器研究两方面为主要内容,楚文化研究包括有城址、墓葬、各种手工业、艺术等,漆器研究包括有漆器制作工艺、造型、纹饰与文字以及某件漆器的考证等。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文物、历史研究的工作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文化与漆器研究/陈振裕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

ISBN 7-03-011236-9

I. 楚… II. 陈… III. ①楚文化-研究-文集②漆器(考古)-中国-文集
IV. K871.41-53②K87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5309 号

责任编辑:杨新政 邱璐/责任校对:柏连海

责任印制:刘秀平/封面设计:王 浩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3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41 1/4 插页: 1
印数: 1—1 800 字数: 851 000

定价: 1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序

严文明

陈振裕同志将自己多年撰写的学术论文选编成集，要我在卷首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早在大学期间，我曾忝为振裕的老师，带领他所在的五九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赴安阳殷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当时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天资不算很高，却十分勤奋好学，这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宝贵品格。记得那时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实习队的生活非常艰苦，发掘工作又非常紧张。队里安排休大礼拜，两个星期才有一天洗洗衣服，料理一下个人的事情。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公休日，他也不放过学习的机会，和另外两个同学找了我一同到洹河岸边进行考古调查，接连发现了好几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代的遗址，有的遗址还有不同时期的文化层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实习的时候如此，平时在班里也是找老师请教最勤的一个，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被分配到湖北省博物馆工作，仍然和我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之间是比较了解的。

振裕在湖北省从事考古工作一晃就有 37 年了，从一名普通的考古工作者，成长为一名全省考古工作的领导者，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其间经历了多少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按照他自己的意见，他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20 世纪 60~70 年代是打基础的时期，80 年代是主动按一定课题进行考古研究的时期，90 年代以来是抓重点和出成果的时期。这不但符合学者成长的一般规律，也是与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包括我国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的。不过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有的人能够不断前进，有的人则少有成绩，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不但生活艰苦，还有政治上的无形的压力。早先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你不积极参加，至少会说你只专不红；接着是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是每个人都很难逃脱的一场浩劫。振裕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坚持学习，坚持下田野，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记得有一次他在云梦挖汉墓，我到他的工地去视察，窄小的房间搁一扇铺板，既当床又当工作台，其余的地方放满了用于发掘的工具、仪器，还有许多图纸和各种资料。饭食十分简单，多少天也难得洗一次澡。其实这种情况在别的工地也是差不多的，振裕却很少考虑生活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考虑再多也没有用，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动作麻利，把工地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发掘完了，好多器物都修复好了，甚至图都画好了，资料也整理得差不多了。一个不大的工地，采取这

种短平快的方式是很必要的。从单位来说避免了资料的积压，从个人来说可以从资料的及时整理中不断地得到提高。在省级考古单位，工作很难单打一，你不能说只能研究某某时期的考古，别的时期我不熟悉做不了；也不能说只会做田野考古，筹备展览或者举办培训班之类的事做不了。往往是有什么事做什么事。这种情况多了，会使人难于集中精力；但如果调理得当，又可以是一种全面的锻炼。振裕正是由于长期坚持田野工作，又得到其他方面的锻炼，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和见识，才能做到厚积薄发，到后来抓课题时能够得心应手，在同代人中获得了较多的成果。

陈振裕是福建人，初在湖北工作时，遇到困难不免产生思乡情绪。但既然命运让他长期呆在湖北，那就只有铁下心来做好工作。在湖北做考古研究，课题自然是很多的，而最大的课题当数楚文化研究。虽然他参加的田野工作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迄明代，毕竟做得最多的是楚文化遗址和墓葬。这样，他把楚文化作为重点研究的课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振裕研究楚文化是从楚墓的研究开始的。早在到湖北省工作之初的 1965 年他就参加了江陵县望山和沙家楚墓的发掘，从 1980 年撰写的《湖北楚墓综述》开始对楚墓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同时着手对早期楚文化的探索，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果的调查。尽管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但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至少为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此后，他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楚文化，便分门别类地进行了多方面的专题性研究，其中涉及到楚国的漆器工艺和装饰艺术、竹器手工业和竹器的装饰艺术、曾楚关系、秦楚关系、楚与吴越的关系以及东周楚城的研究等等，其中不少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在楚文化的研究中，城址的勘探与发掘较之墓葬的勘探与发掘更为重要，难度也大得多。在墓葬的考古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城址的研究自然会提到日程上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城，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调查的结果来看，数量都是很多的，在当时各诸侯国中也许是首屈一指。振裕参加过一些楚城的发掘和勘探工作，并且按层次等级进行过综合研究。尽管限于当时的条件，其研究还只能是初步的，但是他的思路和方法都是正确的，从而为今后楚城的进一步研究，乃至对于整个楚文化的研究都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振裕的研究是多方面的，除了楚文化的研究是重点外，对于漆器、先秦乐器和乐制以及农业考古等方面也有几篇力作值得一读，这里就不用多说了。他虽然已届耳顺之年，然精力旺盛，又勤于劳作，应该有更多和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是我个人的期望，相信也是广大读者的期望！

前 言

这本论文集，是从我 37 年来在考古工作期间所撰写的一百余篇文章中选编而成的。

目前，我国已出版的考古学界学者论文集，大多是泰斗或大师的论文集。这些论文集，原是站在学科的前沿指导与推动学科的发展，其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都是很好的，而我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在湖北境内，所写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上学识粗浅，一直没有编纂论文集的打算。

近几年来，一方面，有不少国内外的同仁因查阅我所撰写的文章颇为不便，希望我能汇编成集；另一方面，回顾我国考古学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后人总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丰富多彩的考古新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从而获得更为科学的研究成果，不断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如果自己这些不够成熟的一己之见，能使考古界的同仁受到一定启发，从而对相关的课题做出更深入的研究，那么，自己也将是为学科的发展尽了一份微薄之力，此其一也。正因为自己才疏学浅，所撰写的文章有许多错漏之处，选编成集后，可以得到更多同仁的帮助，对自己今后从事考古学的研究工作，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此其二也。在校学习期间和参加工作后，一直得到苏秉琦、宿白、邹衡、俞伟超、严文明等老师的谆谆教诲；1964 年分配到湖北从事考古工作以来，许多领导曾从多方面给予关心和支持，同时还得到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帮助，这本论文集，是我 37 年考古工作的点滴收获，将作为向良师益友表示感谢的一份薄礼，此其三也。正是基于以上三点原因，才开始选编这本论文集，并交付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

我是 1959 年 9 月从福建省厦门市第一中学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自此步入我的考古生涯的。1964 年 9 月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1989 年 3 月至今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回顾以往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自 1959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主要是系统地学习考古专业知识，参加以考古工作为主的多种业务工作，同时钻研一些相关的课题。在北京大学学习的五年时间，十分庆幸没有受到干扰，全面地学习了本专业的基础课、技术课、专题课等，为以后的业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1964 年分配到湖北省博物馆工作以后，由于领导的安排与实际工作的需要，仍以

田野工作为主，例如参加与主持了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凤凰山一六八号西汉墓、云梦睡虎地秦汉墓、随州曾侯乙墓等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参加发掘的项目不仅较多，而且时代跨度较大，自旧石器时代直至明代。同时，还参加了湖北省出土文物展的布展工作，如独自承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中湖北展室的布展工作，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湖北省出土战国秦汉漆器展览的布展工作等；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兼职教师；参加文物考古培训班的授课；在《文物》月刊 1972 年复刊后的前 3 期协助工作；征集京山苏家垅曾仲游父青铜器 90 余件；整理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专著），撰写相关论文等。正是这些难得的机会，使自己得到了锻炼，学到了更广泛的知识，并不断地积累了工作经验和提高了学术水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业务工作也没有间断，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第二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学术课题意识逐渐增强，学术研究的力度逐步加大。80 年代初，为了探索早期楚文化，在沮漳河流域与鄂西地区进行专题的考古调查；在配合大型基本建设的工程中，围绕相关的学术课题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为了解长江中游宋代瓷窑的情况，在武昌县青山进行考古发掘等。同时，加大科学研究的力度，例如有关楚文化的课题研究，湖北秦汉墓、音乐考古、湖北农业考古、湖北战国秦汉漆器研究等，并撰写了一系列科研论文。

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末。主要是抓重点课题，出版学术专著。这个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以抓长江三峡工程坝区与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为主，同时兼顾湖北省配合大型基本建设的文物保护单位，认真贯彻执行有关的文物政策，搞好文物保护工作，并初见成效。同时，注意选择学术课题，主要有湖北楚秦汉漆器艺术、中国古代漆器造型纹饰、中国先秦漆器、中国秦代漆器、中国古代青铜器造型纹饰、秦汉简牍文字研究等，还主编了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宜都城背溪等考古发掘报告，撰写了一些研究论文。在这一阶段，对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增多。

二

楚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是湖北最重要的文物考古工作。

1965 年夏，为配合沮漳河水库二干渠工程，我到钟祥、荆门、江陵三地的干渠沿线进行考古调查，在江陵县八岭山一带发现 20 余座有封土堆的古墓，经过考古勘探认定，它们均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当年的秋季和冬季，先后发掘了沙冢墓地与望山墓地，其中沙冢一号楚墓与望山一、二号楚墓，都是有封土堆的长方形竖穴木椁墓。1956 年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陵八岭山以明代王墓群被列为其中之一。经过这次考古调查与发掘，证实了八岭山一带星罗棋布的有冢墓，绝大多数应是楚墓，以及一部分汉墓，只有极少数是明代的藩王墓。

这是我第一次发掘楚墓，这些楚墓不仅棺椁保存较好，而且墓室里有积水。我虽然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期间，曾在安阳发掘过商代墓葬，在洛宁发掘过新石器时代遗址，但楚墓的许多复杂而陌生的情况，如何处理？当时我一方面虚心地向在一起发掘的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学习，另一方面读《长沙发掘报告》等书，认真分析每一个迹象，并做好文字、线图和照片等有关资料的收集工作。在清理沙冢一号墓的椁盖时，由于以往在清理江陵小型墓的椁盖板时未发现覆盖有竹席，因而大家都没有注意。晚上读书时看到长沙四〇六号墓的椁盖板上铺有竹席，马上意识到这座墓有没有？第二天上午开工后，立即先从椁盖板的四角进行清理，果然发现也铺有竹席。经过全面清理后，覆盖在椁盖板上竹席的床数、铺法及每床竹席的尺寸都搞清楚了。

在清理望山一号墓时，揭开椁盖板后，头箱与边箱里放满了铜器、陶器、漆木器等各种随葬器物，以往是采用“倒挂金钩”的办法清理，但此墓的椁室较深，随葬器物有好几层，无法下脚清理下层与中部的器物。经过大家共同商量，把两根圆木棒横置于头、边箱上，在圆木棒近两端处各系一根粗麻绳，绳下置一条长木板，人站在板上清理，绳子随着每层器物清理完后不断下放，不仅清理方便，而且绘图时测量器物的所在位置也更准确。1966年初夏，苏秉琦、王振铎、谢元璐先生受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之托，到江陵检查这批楚墓的发掘情况及各种记录资料，当听到采用这种方法清理时，苏秉琦先生称赞道：“这是墓坑的高空作业，应该写进报告的前言。”这种清理方法显然比“倒挂金钩”的方法好，所以自此之后，湖北在清理这类木椁墓里的随葬器物时，一直沿用这种方法。

1966年夏，江陵望山沙冢8座楚墓中的所有文物运回武汉，组成整理小组进行室内整理，由我负责漆木器保养、陶器修复、绘图、照相和制卡等日常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但仍由我负责继续进行此项工作。在整理时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越王勾践青铜剑会葬于望山一号墓？这座墓的墓主是谁？年代分期是楚墓研究的基础，这8座楚墓的年代如何？围绕这些学术问题，查阅了当时能借到的有关资料，撰写了《望山一号墓的年代与墓主》、《略论九座楚墓的年代》两篇论文。1980年中国考古学会在武汉召开以楚文化研究为中心议题的第二次年会，领导安排我写《湖北楚墓综述》。于是，以当时已发表的考古资料为主，结合有关的文献资料，从湖北楚墓的区域类型、年代分期、墓葬分类、各类物质文化的发展和文化特征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这是第一篇对楚墓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论文。当然，由于当时的资料较少，而且许多专题的研究尚不深入，文中也有一些错漏之处。

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的闭幕式上，苏秉琦先生指出：“楚文化研究是我国考古学科的一个重要课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深入探索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奥秘，把楚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真正地揭示出来。”当时已发掘了一千余座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而对西周时期的楚文化并不清楚，而且关于楚文化的渊源问题，主要有土著说、北来说和西来说三种。苏秉琦先生在这次年会上精辟地指出：“怎样去探索楚文化的特征和渊源？我看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是从下而上，一是从上而

下。” 下而上，就是从已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追溯未知的西周时期的楚文化。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后，湖北的考古工作主要围绕探索早期楚文化而进行。俞伟超先生依据在当阳赵家湖楚墓发掘有年代早至西周晚期的考古资料，西周金文已说明当时的河南南部并非楚地，认为西周楚都丹阳在西侧。在苏秉琦先生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当时主要是在当阳沮漳河两岸地区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以寻找西周时期楚文化遗迹。在第二次年会上，有不少同志以古代文献记载与部分考古资料为依据，著文论证秭归鲢鱼山遗址就是楚立国伊始的都城——丹阳所在地。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1980年我与杨权喜先生到鲢鱼山遗址开展调查，1981年夏进行了小面积发掘。以往认为此遗址为楚都丹阳，最主要的依据是北魏酈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中的记载。经过这次发掘，收获颇丰，我们认为：第一，在鲢鱼山遗址未见到具有楚文化性质的文化遗存，而所出的遗物却具有浓厚的巴文化色彩，并且其时代较早，大约为夏商时期。第二，鲢鱼山遗址没有发现城墙及其他重要遗迹，而且遗址的面积很小，文化堆积不厚，文化内涵不丰富。第三，鲢鱼山遗址的地形险恶，交通不便，没有便于活动的较为广阔的地面。第四，鲢鱼山遗址处于目前发现的楚文化早期遗存所分布的边缘地带。第五，《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楚早期“辟在荆山”，而鲢鱼山遗址距荆山达数百公里。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秭归鲢鱼山遗址不可能是楚国早期都城——丹阳所在地。

我当时认为，在早期楚文化探索中，古代文献记载只是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不能仅仅以此作为依据。考古调查与发掘应首先围绕文献记载的线索来开展工作，肯定了是成绩，否定了也是成绩，也就是说，确定楚都丹阳的地望，最终还必须依靠考古资料。于是，1983年我们又到当阳境内的沮漳河两岸和宜都县进行考古调查，寻找早期楚文化遗址。在宜都城背溪遗址调查时发现了一些类似商周时期的陶片。1983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在此进行发掘，经过整理后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后来严文明先生将它确定为城背溪文化，它是目前湖北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一个文化。原想在当阳等鄂西地区调查、发掘后，再往宜城、谷城一带调查，然后再到与淅川交界的丹江口一带调查，务必找到西周时期楚都丹阳的地望。但是，1984~1986年，因长江三峡工程要上马，领导安排我到宜昌、秭归等地发掘。探索早期楚文化的工作，也因此而中断。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以楚文化为中心的讨论，使我深深感到，要深入研究楚文化，必须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这是楚文化研究的基础和关键；二是加强楚文化的专题研究，只有各个专题研究深入了，楚文化的综合研究才能有深度和广度，也才能真正揭示楚文化的真实面貌。因而这次年会以后，我在研究方面侧重于对楚文化的专题研究，并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收录于本论文集的《楚国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楚国的竹器手工业初探》、《东周楚国竹器的装饰艺术》、《试论曾国与曾楚关系》等，就是这个时期撰写的一部分论文。

东周时期的楚城，不仅是当时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而且这些楚城

的兴起和发展，还与楚国的崛起、兴盛和衰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想在考古学上深入研究楚文化，应以大规模地揭露当时的城址最为重要。湖北境内的楚城，只有江陵纪南城于1975年曾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当阳季家湖楚城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宜城楚皇城仅做了小规模考古发掘，而绝大部分楚城仅仅进行过考古调查。为了加强对楚城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我和杨权喜先生曾计划对湖北境内的楚城进行一次较全面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并视具体情况而适当地进行小规模考古发掘，后因忙于其他业务工作而未能进行。1991年初夏，我应美国伯克利大学的邀请赴美进行学术访问，在北京等待签证与机票的十天时间里，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借阅有关资料，撰写了《东周楚城初探》一文。以往许多学者在研究东周楚城时，常常是一个一个地单独介绍某座楚城的年代、城内布局与城墙、城门、护城壕的构筑方法等。文献记载的楚城有277座，我依据当时收集的50座楚城资料，从其性质与规模大小等方面分析，大致归纳为都城、陪都、县邑和军事城堡四大类，构成了多层次的网状体系。同时，对四类楚城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将楚国都城与列国都城进行比较研究，使人们对楚城的特点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进而对东周楚城与楚国、楚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楚城的产生、发展、鼎盛与衰弱，是与楚国、楚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并且只有通过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东周楚城的研究不断深入。不过，由于当时许多东周楚城尚未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发表的材料也很不齐全，这篇文章论述的深度与广度都还不够，这有待于今后楚城勘探、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关于楚国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我最早思考这个问题是1965年在江陵望山一号墓发现越王勾践青铜剑之时。当时许多学者认为是战利品，经过收集出土的吴越青铜剑和青铜矛的资料，结合有关文献记载，认真地分析研究，我认为有些剑和矛是战利品，还有些青铜剑和矛却是馈赠品，并进一步分析了楚与吴越的关系。根据湖北发现的秦墓探讨秦楚关系，主要源于在云梦睡虎地发掘时看到这些秦墓既与关中秦墓有许多共同特点，又受到楚文化的一些影响，以及睡虎地秦简所记载的有关内容。其中从葬俗来分析睡虎地秦墓的族属问题，在日本曾产生一定的影响。关于曾楚关系的文章，是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发掘后与梁柱先生合著的。我到京山宋河苏家垅收集当时农民在修建郑家河水库中干渠时发现的一批曾国铜器，这批铜器共97件，在铜鼎、方壶、豆等器上铸有“曾侯中子徇父”或“曾中徇父”铭文，这是当时首次发现的两周之际的九鼎墓，墓主为曾侯中子，名徇父。1971年，这批曾国铜器参加在北京故宫博物馆举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时，所有的铭文均请郭沫若先生考证。为编写发掘简报，曾请教邹衡先生和张政烺先生，通过对考古资料与文献的分析，提出了这批曾国铜器与过去在山东发现的姁姓曾国不同，应属于湖北境内的姬姓曾国。1978年夏发掘曾侯乙墓时，在河南南阳的新野与湖北的枣阳、随州、襄阳等地，已发现十余批曾国铜器，证明1971年所写简报的结论是正确的。同时，曾侯乙墓有许多楚文化因素，而且多批曾国

铜器与铸有楚国铭文的铜器同出，认为有必要写篇关于曾楚关系的文章。文章的提纲拟好后，因其他工作被搁下，后来与梁柱先生对原来的提纲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并合作完成了这篇曾楚关系的文章。

三

1972年初夏，当阳县用电报上报国务院称刘家冢发现了楚庄王墓，国务院将电报转到湖北省，我因此前往调查，发现其不是楚庄王墓，甚至不是有封土堆的楚墓，而是东汉画像石墓。当时宜昌地区文化教育局要求我办一期短期考古培训班，各县选派一人参加，后经省里同意，增派杨权喜先生协助办班，并清理刘家冢子一号和二号墓。

1972年冬，在云梦大坟头发现1座汉墓，我和陈恒树二人前往清理。1975年夏，考古发掘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我负责业务工作，即墓葬的清理，文字、线图、照片、电影等资料的总体工作；室内整理阶段，我负责陶器修复、漆器拼对复原、文字制卡、绘图和照相的总体工作，并主编发掘报告。1975年12月，到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工地，给孝感地区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学员讲课，并参加十一号墓的发掘，发现1155枚秦简和大批铜器、陶器及漆木器等，尔后负责云梦睡虎地秦墓的室内整理工作并主持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王朝，但它仅仅存在15年就灭亡了。从考古学研究来断定秦代的文物，是有一定难度的。湖北发现的秦墓，其葬俗与楚墓的葬俗迥然不同，在年代方面包括“秦拔郢”（公元前278年）后的战国晚期，而且秦代墓葬所出器物，与西汉初年又有许多共同特征。因此，必须首先建立秦汉时期的年代学，才能够进一步研究。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依据云梦睡虎地秦墓和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等有确切年代的纪年墓，进行秦汉墓的年代学研究。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湖北秦墓和西汉墓的墓葬类型、文化特征、年代分期，以及与周边秦汉墓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当然，收录于这本论文集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虽然涉及许多问题，但研究的力度不够，尚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

1987年，千家驹先生主编《中国钱币大辞典》，编辑委员会要我负责湖北秦汉半两钱的编写工作，在收集有关考古与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湖北秦汉半两钱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自从《洛阳烧沟汉墓》面世之后，许多考古工作者往往依据两汉墓出土什么铜钱来断定该墓的年代。我在撰写这篇文章时，觉得早期的铜钱可以葬于当时的墓中，而晚期墓中也可能随葬早期的铜钱，认为以钱断定墓葬的年代是不够科学的。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采用了以墓断钱的方法。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秦半两在秦统一之前就已存在，而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不是重新铸新铜钱，而是以秦国的半两铜钱来统一全国货币。据云梦睡虎地秦简的记载，当时秦国还流通其他的货币。

四

1965年发掘的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出土了战国时期楚国的大批漆器。1975年先后发掘了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西汉墓和云梦睡虎地秦墓，又出土了大批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漆器。虽然在编写考古发掘报告时对漆器进行了分析，但并未对漆器进行专题研究。

1979年夏，为了加强馆际之间的交流，上海博物馆邀请湖北省博物馆到上海举办湖北出土战国秦汉漆器展览，并要求在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市各举办一次学术讲座。当时安排我负责此项任务，从挑选展品到撰写展品说明和展览前言，并准备了3万余字的讲稿。举办此次展览期间，在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市作了两次《湖北出土战国秦汉漆器》的演讲，并举办了一次漆器研究专家与漆器厂技术人员共同参加的学术研讨会。1979年冬，应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的邀请，到南京大学作题为《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期》的学术报告。

自从到上海博物馆举办漆器展览以后，我觉得漆器因难于保存，没有历代漆器的传世品，因而历代也没有著录；近代考古发现的漆器也不多，故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漆器与铜器、陶瓷器等文物，既是历代珍贵的文化遗产，又是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以往的发现与研究较少，而有关漆器的许多问题又必须解决，还有湖北出土的大批战国秦汉漆器，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选择它作为我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

如何对战国秦汉漆器进行研究，我当时认为必须有个研究计划。首先，应建立这个时期漆器的年代学序列。《试论湖北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期》一文，是我研究漆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我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湖北出土的战国秦汉漆器，从漆器的形制分类、漆器的纹样分析、形制与纹样的基本组合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共分为五期（其中第四期分为二段），依据有年代可考的纪年墓，确定各期相应的年代，并概括其形制与纹样的演变规律。

其次，应着重进行专题研究，为综合研究打好基础。迄今已完成了这个时期的漆器文字分析，漆器的胎骨与制作工艺，漆器的造型艺术，漆器的装饰纹样，一些纹样名称的考证，某件漆器的分析，以及楚国漆器的产地、漆器手工业、楚国漆器装饰艺术等的研究。其中《中国漆器起源探索》一文，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缅甸召开东亚漆器艺术国际学术研究会之邀请而撰写的论文。当时我认为中国有近七千年的漆器历史，断定中国漆器始于商代是不对的，而国外对中国漆器工艺史又不了解，有必要进行介绍，因而选择这个题目，在这次国际学术会上影响较好。

再次，进行漆器的综合研究。在这方面我是从小地域开始的，第一篇文章是《略论睡虎地出土秦汉漆器》，仅从一个墓地的漆器进行综合研究，即对这批漆器的胎骨与制法、器皿造型、装饰纹样等方面进行分析。此后又写了《楚国漆器工艺》、《湖北楚秦汉

漆器综述》等文章，综合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20世纪90年代，在主编《中国漆器全集》第一、二卷时，分别撰写了《先秦漆器概述》和《秦代漆器综论》的文章；在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我国夏商时期的漆器工艺》一文。它们都是从全国范围内某一时期的漆器入手进行综合研究的。《中国历代漆器工艺的继承与发展》一文，着重从历代漆器工艺的辉煌成就，以及现代漆器生产的现状与对传统漆器工艺的继承与发展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为庆祝我的老师邹衡先生75华诞和从事教学科研50周年，撰写了《战国时期楚漆器群研究》一文，是对战国时期楚国漆器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一次尝试。

五

我从中学开始就一直较喜欢体育运动，尤其对篮球情有独钟，至今还经常参加篮球运动。对于文艺活动，因缺乏艺术细胞，从小就不爱唱歌跳舞。撰写音乐考古的文章，是一次很偶然的机遇。记得在1979年夏天，湖北省考古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当时我是筹备组的秘书，具体负责会议的会务工作。有一天晚上偶然在《文物》1979年6期看到一篇文章，作者认为虎座鸟架鼓的性质与镇墓兽等相同，应定名为“山神像”。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对，第二天到湖北省博物馆图书室查阅有关资料，晚上撰写了《谈虎座鸟架鼓》一文，这是我的第一篇关于音乐考古的文章。这篇文章从山神像的主要特征和有关的文献记载，认为虎座鸟架鼓并非山神像。依据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对其性质与定名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它的性质是鼓，即一种乐器，并认为它是《隋书·音乐志》中所记的一种悬鼓，应称之为虎座鸟架悬鼓。这个定名，至今仍被沿用。

1978年在随州发掘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各种文物达15000余件。其中各种质料的乐器共9种124件，尤其是65件青铜编钟，可演奏许多古今中外的乐曲，它是我国音乐史上的一次空前发现，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批稀世珍宝。为纪念曾侯乙墓重大考古发现10周年，1988年11月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曾侯乙编钟”学术会议。《中国先秦青铜钟的分区探索》一文，就是我向这次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我国先秦青铜钟发现较多，此文仅就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的青铜钟进行了探讨，简述其考古发现概况，进行类型分析与年代分期，并对两个地区先秦青铜钟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分析。

曾侯乙墓发掘后，为再现曾侯乙青铜编钟高度发达的音乐水平，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复制，并搬上舞台演奏。此墓的石编磬共32件，出土时已有残缺。为展览与演出之需，20世纪80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进行石编磬复制研究，并在襄阳采取磬料进行复制。看到石磬复制工作在紧张而忙碌地进行着，我想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应对石磬进行全面研究。于是开始收集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撰写了《中国先秦石磬》一文，1988年11月提交给“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曾侯乙编钟”学术会

议，并在大会宣读。这篇文章从石磬的考古发现概况、石磬的形制、石磬的制作工艺、石磬的测音及其相关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现在收于这本论文集的这篇文章，是近年经过修改补充后发表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带德国留学生罗梅歌博士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在介绍曾侯乙墓各种器物的出土情况时，我注意到曾侯乙墓的乐器分两处放置：青铜编钟、石编磬、建鼓与瑟、笙等乐器同出于中室，而东室的乐器中未见钟、磬。我马上想到，这就是文献所记的雅乐与燕乐。当时《曾侯乙墓》发掘报告已出版，但未谈到这个问题，于是想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后来因忙于俗务而未动笔，1996年才抽空撰写了《曾侯乙墓的乐器与殉人》。我主要从中室和东室的乐器入手分析，认为中室的乐器，应是当年曾侯乙祭礼与宴飨宾客之雅乐或作为宴飨的燕乐乐器；东室的乐器，则是当年曾侯乙使用的房中乐或内庭之乐的燕乐乐器。此墓殉葬21个少女，依据《仪礼·春官·磬师》与《仪礼·燕礼》等记载分析，认为她们的身份应是姬妾。

1998年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建所40华诞的喜庆日子，《远望集》就是为庆贺华诞而编辑的一本论文集，应韩伟先生之邀为该论文集写篇文章。写什么呢？在楚文化的研究中，我觉得东周时期楚国的用鼎制度与《周礼》所记并不尽相同，已有学者著文论述了，而关于东周楚国的乐制，却没有专文分析，于是选择了这个题目，写了《东周楚乐初探》一文。这篇文章主要依据考古发现的墓葬乐器资料，对年代与墓主身份明确的墓葬出土的乐器进行分析，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探讨东周时期楚国各类墓葬中随葬乐器的情况，以及各类墓葬随葬乐器的时代早晚变化情况，对东周时期楚国乐制进行了分析研究。

六

《农业考古》杂志系江西省博物馆创办。1981年该刊主编陈文华先生要我为该刊写篇关于湖北农业考古方面的文章，陈文华先生与我是老乡，又是我在厦门市第一中学读书时的师兄，所以答应了。为了搞好湖北省的文物普查工作，做好编写《湖北省文物地图集》的基础工作，省文化厅文物处在孝感市举办全省文物普查工作培训班，安排我讲授秦汉考古课，并给一个月的备课时间。1978年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担任兼职教师，也是讲授战国秦汉考古课程，因而利用这段备课时间为《农业考古》撰写了三篇文章。

《湖北农业考古概述》一文，主要依据湖北省30余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并结合有关历史文献，分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和六朝隋唐时期等五个部分，概括地介绍了湖北省农业考古的情况。

1973年和1975年，先后在江陵凤凰山发掘了30余座秦代和西汉墓，出土了大批内容十分丰富的简牍，其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在《从凤凰山简牍看

文景时期的农业生产》一文中，主要依据这些简牍记载与墓中出土实物，从农业奴隶与农具、农民及其负担、农作物与食物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反映了当时官吏争置土地，并驱使大批奴隶为他们耕种，而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是以占有小土地的自耕农为主，但他们的负担相当沉重。简牍还记载了许多农作物与食物，为研究当时江陵地区的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

1975年冬在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1155枚秦简，内容也非常丰富，其中也有许多简文反映了秦代的农业生产情况。在《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农业生产》一文中，依据秦简与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从秦国的农业生产与多种经营、粮食加工与管理制度，以及当时从事农业的生产者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战国晚期至秦代的秦国农业生产。

这个时期还撰写了其他内容的一些文章，本集所收录的《外销瓷的几个相关问题》就是其中的一篇。

这本论文集所收录的51篇论文，都是从20世纪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中选编的。作为考古战线的一名老兵，在新的21世纪，我仍将遵循自己的人生格言：“勤奋、务实、敬业、奉献”，在文物考古这块园地，更加努力地耕耘，为百花盛开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陈振裕

2001年3月20日于武昌东湖

目 录

序	严文明/i
前 言	iii

壹 综 论

湖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1
《中国古代青铜器造型纹饰》序论	15

贰 楚文化研究

东周楚城初探	33
湖北楚墓综述	54
略论九座楚墓的年代	69
望山一号墓的年代与墓主	85
略论鄂东战国楚墓	93
湖北楚简概述	105
楚国青铜器的装饰艺术	112
精美的吴越青铜剑和矛 ——兼论楚与吴越的关系	126
楚国的竹编织物	138
楚国的竹器手工业初探	154
东周楚国竹器的装饰艺术	165
加强楚艺术的基础研究	174
试论曾国与曾楚关系	178
早期楚文化探索二十年	193

叁 秦汉考古与文化

略论湖北秦墓	209
试论湖北地区秦墓的年代分期	220
从湖北发现的秦墓谈秦楚关系	236
湖北西汉墓初析	246
湖北秦汉半两钱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258
江陵汉墓与汉代文明	269
湖北秦汉简牍概述	272

肆 漆器研究

先秦漆器概述	282
秦代漆器综论	303
《中国古代漆器造型纹饰》序论	317
湖北楚秦汉漆器综述	343
楚国漆器工艺	365
中国漆器起源探索	383
我国夏商时期的漆器工艺	388
我国东周漆器的分区初探	395
试论湖北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期	404
试论楚墓出土漆器的产地问题	421
试论战国时期楚国的漆器手工业	429
湖北出土战国秦汉漆器文字初探	438
楚国漆器的装饰艺术	465
楚国车马出行图初论	474
试论秦汉漆器的两种纹饰	487
略论镇墓兽的用途和名称	497
中国历代漆器工艺的继承与发展	509
试论秦代牛马纹漆扁壶	513
“澠”与“澠工”探析	520

伍 音乐考古

中国先秦青铜钟的分区探索	526
中国先秦石磬	543
东周楚乐初探	576
曾侯乙墓的乐器与殉人	586
谈虎座鸟架鼓	596

陆 农业考古

湖北农业考古概述	600
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农业生产	614
从凤凰山简牍看文景时期的农业生产	625

柒 其 他

外销瓷的几个相关问题	634
编后记	640

壹 综 论

湖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处长江中游，东控吴越，西通巴蜀，南邻百越，北连中原。长江横贯东西，京广铁路纵穿南北，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境内三面群山环抱，中部平原地区湖泊星罗棋布，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我们的先民早在一百多万年前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回顾湖北的考古工作，从无到有，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科学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令人欣慰。展望未来，湖北考古工作的前景必将更加美好，催人奋进。

一

古称楚地的湖北，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璀璨的古代文化，历代许多重要的文化遗存和珍贵文物，都曾在这里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湖北乃至中国的古代文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中国成立之前，湖北的考古工作处于空白，湖北考古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逐渐开展起来的。通观湖北考古 50 年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初，是湖北考古工作的初创时期。从 1954 年开始，在配合城市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由于当时人手少，任务重，研究工作相对滞后。

第二阶段，自 1965 年至 1977 年，是湖北考古工作出现波折，但仍有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包括配合建设工程和主动发掘两个方面，许多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同时，各科研机构抓紧考古资料的整理，并较快地发表，对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三阶段，自 1978 年至今，即改革开放以来，是湖北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考古工作也包括配合基建和主动发掘两方面，并以配合基建的工作为主。但

在配合基建工程中注重围绕课题开展工作，主动的考古发掘项目的学术目的性也更加明确。这个时期的科研工作极为活跃，不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发掘简报，而且对许多学术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 1000 余篇论文，已出版的专著达 30 余本，并有 20 余本已完成初稿或送出版社待刊，可谓成果丰硕。出成果、出人才，湖北省的文博队伍不仅壮大了，而且业务素质与政治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不仅活跃着一批有经验的老专家，而且许多年青学者也脱颖而出。

二

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荆楚大地有许许多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考古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再现了这块热土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使湖北跃居为我国的文物大省。

（一）旧石器时代

探索人类起源和演化问题，是湖北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学术课题。1956 年在长阳县下钟家村出土一件早期智人的上颌骨化石^[1]，是中国南方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先后在湖北的西部、东部和西北部等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达 200 处以上。其中许多地点还进行了科学发掘，获得人类化石及大批共存的动物群化石和石制品，而且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不同阶段文化的发展序列较为清楚。

湖北地区不仅发现人类化石的数量较多，而且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三个阶段的人类化石齐全，在全国尚属少见。在建始巨猿洞出土了大批巨猿牙齿化石及共存的动物群化石。郧县梅铺龙骨洞出土了古人类牙齿化石 4 枚，郧西神雾岭白龙洞出土古人类牙齿化石 8 枚及共存的动物群化石，这两处遗址的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晚期。郧县曲远河口遗址出土了保存基本完整的人头骨化石 2 件，在我国尚属罕见，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2]。这里发现的人头骨特征较原始，属直立人类型，简称“郧县人”；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古地磁测年结果为距今 90 万~80 万年，文化遗存应属旧石器时代早期。旧石器时代中期发现的“长阳人”，为早期智人。汉阳发现了人颅骨化石，为晚期智人，称为“汉阳人”。这些发现说明，湖北是研究人类起源及其演变的重要地区。

湖北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数以万计，而且早、中、晚三个阶段都有发现，这在全国也是极少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曲远河口遗址，发现石制品 300 余件，以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很少；石器类型以砍砸器为主，但也有少量典型的尖状器；石器加工方法以单面加工为主，少量器物为两面加工。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枝城九道河遗址，出土石制品 395 件，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和刮削器四类。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樟脑洞遗址，出土石制品近 2000 件。江陵鸡公山遗址的发掘面积达 467 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

的石制品和碎石^[3]。该遗址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上层出土石制品近 500 件,绝大部分为小石片石器,绝对年代为距今 2 万~1 万年;下层发现的石制品有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钻等,绝对年代为距今 5 万~4 万年,它们将人类对江汉平原的开发历史大大提前。因此,湖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

(二)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一直是湖北考古的重点。目前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 2000 多处,并对其中 100 余处进行了田野发掘,有许多遗址还进行过大规模揭露。50 年来,随着大量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已较为清楚。主要成就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基本建立起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系列,并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类型、文化内涵及文化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立了长江中游文化区的特殊地位。二是围绕聚落形态的研究课题,开展以屈家岭文化 6 座古城为中心的文明起源过程探索,认识到本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掘^[4]及屈家岭文化的命名为标志,揭开了湖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大约到 80 年代中期,基本上确认了几支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从总体分析,汉水以东和汉水以西两个地区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差异,并且有各自的发展轨迹。

汉水以西地区的田野发掘工作较多,已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体系,其文化的发展序列为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在学术界已达到共识。在秭归朝天嘴遗址和柳林溪遗址,都发现了城背溪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两者的承袭发展脉络明晰,它们与洞庭湖地区的原始文化关系密切,而此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显然是来源于汉水以东地区,但都保留了部分地方传统。城背溪文化是目前湖北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以夹砂红陶为特色,多饰绳纹,典型器物组合为釜、钵、支座。主要分布于长江干流的枝城、枝江、宜昌、秭归、巴东等地,西达巫峡,同时在麻城后岗遗址也发现了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存。秭归东门头遗址新发现的太阳人石刻,丰富了城背溪文化的内涵。大溪文化以夹炭红衣红陶为特点,其分布范围有所扩大,可划分为三峡地区的中堡岛类型和江汉平原西部的关庙山类型,前者以山地渔猎经济为主,后者以平原农业经济为主。在江陵朱家台遗址,发现分布密集的圆形和方形灰坑,可能用做祭祀坑;发现长方形台基式建筑,台基的护坡经火烘烤成硬面,代表了较高的建筑水平。在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大量的刻划符号,蕴含了文字起源的重要信息。

汉水以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发展序列包括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并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其势力空前扩张,几乎涵盖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由若干地方类型构成的统一文化共同体。这一文化的石制工具向小型复合式演化,快轮制陶技术普遍推广。在天门邓家湾遗址发现孔雀

石、铜渣等,在江陵阴湘城出土多件髹漆器,反映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此文化发现的6座古城和中心聚落,以及大型多间式排房建筑等,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石家河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所发现的屈家岭文化的筒形器遗迹,石家河文化的陶缸刻符、葬玉瓮棺和数以千计的陶塑艺术品^[5]等,为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文化艺术和宗教思想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这些考古学文化,都具有独自的文化特点。同时,它们与周邻地区的文化也是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的。在鄂西北地区,显示出中原仰韶时代、龙山时代文化与湖北地区古文化之间相互渗透融会的轨迹。鄂东南地区文化面貌复杂,湖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文化间的势力此消彼长。大致在大溪文化时期来自江汉平原的文化影响较大,而屈家岭文化时期则薛家岗文化向西扩张,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结构。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聚落考古工作受到重视。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在江汉平原发现了一批以屈家岭文化城址为中心的聚落遗址,目前所见有天门石家河、荆州阴湘城、荆门马家垸、石首走马岭、应城门板湾等6座城址。这些城址在位置的选择、城址的形态及营造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共性。这些城的面积大小不同,一般在7.8万~24万平方米,其中石家河城址的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古城,它的周围则聚集了30多个中、小型遗址^[6]。从该城址发现的遗迹、遗物之丰富及文物的精美与进步程度看,它无疑已成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和代表,是聚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对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遍布湖北省各地。从考古资料分析,这个时期湖北地区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此消彼长。相当于夏代的湖北古代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这类文化遗存主要见于石家河、六合、白庙子等遗址,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稍晚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黄陂盘龙城和江陵荆南寺遗址,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晚期。从二里岗下层文化阶段开始,商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刻,分布范围也更广,东至黄梅意生寺遗址,西到江汉平原以及整个鄂东北地区。

盘龙城是我国南方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1974年和1976年曾两次大规模发掘^[7]。近长方形的夯土城垣保存较好,城垣外有城壕遗迹。城内东北部高地上发掘了两座宫殿基址,规模宏大,是我国最早发掘的两座商代早期宫殿基址,其建筑结构及平面布局与文献所记的“前朝后寝”的建筑布局相似。城外还发现手工业作坊区、平民与奴隶居住区以及平民与奴隶主贵族的墓地,其中李家嘴二号墓是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座商代殉人的奴隶主贵族墓。在墓葬与遗址中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其中大圆鼎、铜钺及大玉戈等堪称珍品。

商代晚期,商文化的势力在南方大范围退缩,目前只在鄂东北的少数地点有所发现,其他地区则土著文化迅速发展。但是,这些土著文化的面貌并不相同,从目前的资

料看,可大致分为鄂东南、江汉平原以及清江流域与三峡地区三大块,延续的时间一直到西周早、中期,它们可能与百越、百濮、早期巴人等族属的活动有关。这个时期还出土了大批铜器,其中不乏珍品,例如在崇阳白霓出土的铜鼓,为目前同类形制的器物在国内仅存的一件。

矿冶遗址的发掘是从湖北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开始的,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收获,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目前在大冶、阳新、钟祥、鄂州、郧县等地,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古矿冶遗址。自1973年以来,先后在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8],清理出商代、西周、春秋、战国至汉代的不同结构、采用不同支护方法的竖井(包括斜井、盲井)数百座,大小平巷数百条,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上千件。其中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矿井,在没有现代动力机械的生产条件下,掘至40~50米深处,并且有效地使用了竖井、斜井、盲井和平巷相结合的开挖方式,还初步解决了井下的支护、通风、排水、提升和照明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已发现的8座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基本具备了近代鼓风机炉的结构。在竖炉旁出土的粗铜块,含铜量达93%以上。据测算,铜绿山古铜矿至少生产了10万吨以上的粗铜,为当时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还发现四五十万吨已成碎片状的古炼渣,表面光滑,渣的流动性能良好,平均含铜量只有0.7%,欧洲至19世纪末才达到如此冶炼水平。显而易见,当时的铜矿开采和冶炼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西周早、中期许多遗址和墓葬的发掘,揭示了湖北地区周文化的全新面貌。至西周晚期以后,地方文化再次迅速发展,鄂西地区主要是楚人控制的范围。西周和东周时期发现了许多带有国名的铭文铜器,主要有楚、陈、江、黄、曾、蔡、越、吴、巴、北、漾、长、邓、息和魏等,反映了周王室分封诸侯及湖北境内小国林立的历史情况。

曾国铜器的发现最引人注目,迄今已有20余批。1967年在京山苏家垅发现的“曾侯中子游父”铜器90余件,是湖北省范围内首次发现的曾国铜器,也是我国最早发现的西周九鼎墓。1978年发掘的随州曾侯乙墓^[9],是我国考古史上一次重大发现。这座墓的墓主人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国君,名乙,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该墓规模宏大,面积达220平方米。墓中各种质料的随葬品达15000余件,保存之完好,工艺之精美,器类之繁多,文字资料之丰富,都是同时期墓葬中所罕见的。出土的9种125件乐器,种类齐全,数量之多,也是迄今仅见的,并首次发现早已失传的琴、排箫、篪等,这批乐器全面地展示了我国先秦音乐艺术的水平。其中65件青铜编钟,至今尚能演奏古今中外的各种乐曲,堪称世界奇迹。用熔模铸造法制成的青铜尊盘,代表了中国先秦青铜铸造的较高水平。二十八宿衣箱,是我国迄今发现记有二十八宿全部名称,并有北斗、四象与之相配的一件最早的天文实物资料。其他大批造型及纹样瑰丽多姿的各种文物,也是研究先秦美学的宝贵资料。丰富的文字资料,则为湖北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99年在墓坑东侧又发现5个器物坑,其中一个坑出土青铜帐篷构件400余件,也是这个时期的首次发现。

（四）东周楚文化

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是湖北最重要的文物考古工作。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获得丰硕的成果，充分展示了独具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楚文化面貌，同时还有力地推动了楚学的研究，使楚文化在我国东周列国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首屈一指。

楚国最早的城市即西周时期的丹阳，目前尚未发现。东周时期的楚城，不仅是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而且这些城的兴起和发展，还与楚国的崛起、兴盛和衰亡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已发现的十多座楚城，分布于湖北省各地，建造年代大多为春秋晚期之后。从这些楚城的性质看，可分为都城、陪都、县邑和军事城堡等四类，构成了楚国城址多层次的网状体系。在江陵纪南城和当阳季家湖楚城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对城垣、城门、城壕遗迹，以及城内大型夯土台基和布局等都有所了解。但是，春秋晚期之前的楚国郢都在何处，学术界的意见仍分歧较大，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证明，尚有待于今后更多的工作。目前在潜江龙湾西距纪南城约 50 公里处，调查发现了放鹰台、荷花台等十余个夯土台基群，并于 1987 年和 1999 年先后对保存较好的放鹰台进行大规模发掘，首次发现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型宫殿基址，其性质可能是楚王离宫别馆。

楚墓分布遍及湖北全省各地，至今已发掘的各种类型楚墓达 5000 余座，在全国各省中发掘东周墓以及发表的简报、专著和研究论文的数量都是最多的。这些楚墓的形制基本相同，随葬器物有许多共同特点，但也有一定差异。依据文化特点的差别，可分为鄂西地区、汉水中游和鄂东地区三大块。以江陵、当阳为中心的鄂西地区，是楚文化的中心区，最具楚文化的特点。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游地区，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枢纽，其文化特点具有一些中原文化因素。以鄂州为中心的鄂东地区，大约到春秋中期才成为楚地，并与吴、越接壤，其文化特点必然具有一些吴越文化因素。当然，楚文化也有其发展过程，它不断地融合其他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因此，上述三个地区楚文化的特点，也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年代分期是楚墓研究的基础，现在已基本建立起楚墓的年代学序列，即自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晚期可分为七期，各个时期的陶器基本组合与器物特征较明显。从总的时代变化分析，则可分为春秋与战国两大阶段。

作为观念形态的埋葬习俗，是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湖北发现的楚墓，大致可分为五个类型。第一类，多重棺槨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主要有成套的青铜礼器及编钟、编磬、鼓等乐器，墓主身份相当于楚国封君这个等级。第二类，亦为多重棺槨大型墓，随葬品丰富，主要有成套的青铜礼器，但未见钟、磬，只有鼓、瑟等乐器，墓主身份相当于上大夫这个等级。第三类，多重棺槨的中型墓，随葬品较多，包括成组的青铜礼器（战国时期还有成套的仿铜陶礼器），但只有少量鼓、瑟等乐器，墓主身份相当于下大夫这个等级。第四类，单棺单槨的小型墓，随葬品较少，未见成组的青铜礼器（战国时期有成套的仿铜陶礼器），鼓、瑟等乐器也极少见，墓主身份相当于士这个等

级。第五类,单棺或无棺的小型墓,其中单棺墓的随葬品很少,无棺的小型土坑墓则绝大多数没有随葬品,这应当是当时楚国社会的最下层——庶民这个阶层的墓。

东周时期的楚国遗址和墓葬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大部分出于墓葬,而且由于楚墓的墓坑填有密封性能较好的白膏泥,使丝织品、竹木漆器等有机物质得以保存。这些丰富的文物是研究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湖北楚墓各期出土青铜器形制与花纹的变化,是与各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数以千计的楚国青铜器,用途非常广泛,而且自春秋中期之后便形成独特的风格。从大批的青铜器分析,楚国在铸造上已掌握失蜡法、分铸焊接、套铸法以及复合金属工艺等先进技术,装饰上广泛采用直接铸纹、镶嵌红铜与绿松石、错金银、鎏金、贴金、线刻、器表硫化处理等工艺,反映出楚国的青铜铸造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楚墓中还发现不少吴、越、魏、蔡等国的青铜器,对研究楚国与这些诸侯国的关系也有一定意义。

楚国的漆器工艺相当发达,在东周各诸侯国中首屈一指。楚墓出土的漆器近百种达3000多件,种类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漆器的制作方法,因质料与器形不同而各有差异。器物造型千姿百态、琳琅满目,十分注重实用与美观相结合。镇墓兽、虎座飞鸟、鹿等漆器,为其他东周列国所未见或少见,可能与楚人信巫风气盛行有关。彩绘花纹繁缛多变,图案优美,线条交错勾勒,各种色彩搭配谐和悦目,并注意与造型的高度统一。所发现的漆器艺术珍品非常多,例如包山二号墓出土的一件彩绘车马人物奩^[10],画面中车啸马嘶,场面十分壮观,写景状物,生趣盎然,是件不可多得的楚国漆画艺术瑰宝。望山一号墓发现的一件彩绘木雕小座屏^[11],在长51.8、屏宽3、座宽12、通高15厘米的小座屏上,巧妙地将透雕与浮雕的凤、鸟、鹿、蛙、蟒、蛇等55个相互争斗的动物交织成生动的画面,堪称巧夺天工,是我国先秦木雕和漆器的杰作。

楚国的丝织品,在望山、包山和马山等楚墓中都有发现,其中马山一号墓^[12]是我国先秦丝织品的一次最集中、最重要的发现,被誉为楚国的“丝绸宝库”。这些丝织品的品种齐全,花纹美观,色彩艳丽。经分析研究,这批丝织品主要是楚地的产品,当时已掌握了饲蚕、缫丝、织造和炼染等整套技术,而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望山一号墓出土的一件石字菱纹锦绣,技法高超,是我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锦绣珍品,将我国在锦上刺绣的历史提前了1700年。另外,楚墓中还出土大批的竹、木、铜、铁、陶瓷、皮革、琉璃、玉、石、骨等质料的文物,大型错金银铁带钩、缝衣钢针、折叠床等是其中的珍品。这些各种质料的文物,是研究楚国手工业发展水平和文化艺术等方面成就的重要实物资料。

内容丰富的战国时期楚国竹简,是研究当时楚国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湖北地区的17座墓中发现有战国楚简,字数达4万字以上,是我国发现战国时期简牍资料最丰富的地区。简文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文书、卜筮祭祷记录、日书、遣策以及《老子》等几部古籍。其中包山二号墓的简文首次披露楚国的司法程序和许多案例,还涉及历

法、地理及楚人先祖老僮、祝融、嫫姆等重要内容。郭店楚简包括多种古籍，其中两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为儒家学派的著作^[13]。其中有少数篇目不见于今传古籍；有的虽见于今本，但在篇章结构及次序等方面有较大差别，内容也不尽相同。这批简文弥补了先秦文献之不足，对于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五）秦汉时期

秦代的历史非常短暂，其考古学文化不易辨识。20世纪50~70年代初在湖北发掘的一些小型秦墓，或归为战国墓，或划为西汉墓。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墓^[14]，其中发现两座纪年墓，七号墓为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十一号墓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为湖北及南方地区秦墓的断代树立了标尺。湖北地区的秦墓，其年代包括公元前278年秦拔郢并设置南郡之后的战国晚期和秦代两个时期。有的学者依据睡虎地这两座纪年墓为标尺，对以往湖北地区的发掘资料进行梳理，建立了秦墓的年代学体系，并确定了一批秦墓。

目前在云梦、江陵、宜昌、宜城、襄阳、鄂州、郢县等地发现近200座小型秦墓。这些墓多为竖穴土坑墓，无封土堆和墓道。墓坑中填土为五花土和白膏泥，葬具为木棺槨，可以看出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有些墓坑还设有二层台或四角有足窝，槨盖板上置牛、马头骨，四角见有灰烬等墓祭遗迹，具有关中秦墓的文化特点。绝大多数墓随葬日常实用的铜、陶器，但也有少数墓仍随葬鼎、盒、壶或豆等仿铜陶礼器。从这些墓的总体文化特征分析，它们受秦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主要特点与关中地区秦墓基本相同，但仍受到楚文化的一些影响，形成了湖北地区秦墓的文化特点，而与关中及其他地区秦墓存在一些差异。

湖北地区秦代大量简牍的发现，其数量及内容之丰富，都居全国第一。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1155余枚秦简，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编年纪》、《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及《日书》甲、乙种等10种。其中秦律占一半以上，在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5]。云梦龙岗六号墓出土150余枚秦简^[16]，主要内容涉及禁苑、驰道、田地及马、牛、羊管理等，并以律文为主，有些简文与睡虎地秦简相同，而驰道管理等内容则为首见。江陵王家台十五号墓出土一批秦简^[17]，主要内容有《日书》、《效率》、《易占》等，其中《易占》简文证实《归藏》一书的存在、产生与流传。睡虎地四号墓出土二件秦代木牍，内容为家信，为我国首次发现。牍文中谈到秦统一六国战争的一些情况，其中有关兵士军需的内容为现存史书所未记载。这些内容丰富的大量秦代简牍，是研究秦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宝贵史料。

现已发现的秦代漆器达20余种，500余件，保存基本完好，居全国首位。在继承战国时期漆器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卷制与钹器的制作工艺有了进一步发展。秦代漆器十分注重实用性，楚国常见的镇墓兽等丧葬明器已未见，生活用器明显增多。造型艺术更加注意美观与实用相结合，并日趋成熟。装饰纹样中未见狰狞恐怖的纹样，花纹图案优

美。在许多漆器上并有烙印、针刻和墨书文字，反映出秦代的漆器制作已有多道工序，并有“物勒工名”制度，内容还包括漆器产地等情况。

汉墓遍布全省各地。其中在江陵发现 6 座西汉纪年墓，另在房县乱葬岗、二龙岗及枝城和巴东发现 6 座东汉纪年墓，为建立湖北地区汉代墓葬年代学序列提供了依据。已发掘的墓葬均为中、小型墓，墓主的级别较低。西汉初至中期，仍沿袭了秦（或楚）的竖穴土坑木椁墓的葬制，中型墓一般有封土和斜坡墓道，鄂西地区还发现少数岩坑墓和夫妻异穴合葬墓；随葬品以日用陶器为主，中型墓还出有漆木器、铜器等。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尸，对研究我国古代医学史等方面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8]。大约至汉武帝时期葬制发生较大变化，夫妻合葬和多人合葬的家族墓地开始兴起，近年在三峡地区也有发现；随葬品中表现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明器日益增多。西汉晚期开始出现小型砖室墓，到东汉时期更为流行，墓葬形制更是多种多样；随葬品一般为一套日常生活用器和陶明器。东汉时期，还在一些地区发现画像石墓和画像砖墓，画像石墓系砖石混筑的多室墓，画像内容简单，风格与南阳地区接近。

在湖北的 15 座汉墓中发现西汉简牍，数量巨大，其中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竹简即达 1200 余枚^[19]。这些简牍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遣策、告地书、律令、医学、算书、军事、历法、日书等。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的简文内容有一半以上为汉初律令，包括金布律、奏律、史律、均输律、贼律等 20 多种，使我们对萧何制定的九律有所了解。简文中还见有《脉书》、《引书》、《算数书》、《奏谏书》、《盖庐》等五部佚书。其中《算数书》比我国现存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早 300 年，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次惊人发现。此墓与二五八号墓都出有历谱，是我国考古发现较早的历谱。凤凰山十号墓的简文内容包括赋税、刍稿、贷种实、徭役、经商、遣策等，许多也是首次发现。凤凰山一六八号墓的遣策简文中，则记有当时使用家内奴婢种田的情况。这些简牍的内容涉及西汉社会的各个方面，弥补了史书记载之不足，对研究西汉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湖北地区的西汉墓出土数以千计的精美漆器，品种达 30 余种，多保存完好。夹纻胎的漆器比秦代明显增多，许多陶器上也髹漆彩绘花纹。旋制技术的运用，是漆器制作工艺的一大进步，不仅使器形更加规范美观，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在造型和装饰方面非常注重实用与美观相结合，并采用锥画和暗纹等新工艺，达到很高的水平。漆器中有许多珍品，其中光化五座坟出土的两件卮，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戗金漆器。另外，在张家山西汉墓发现我国年代最早的青铜虎子和制作精美的龙凤纹铜洗。东汉时期，在三峡地区的秭归和房县发现摇钱树，当阳等地出土早期青瓷器，云梦周田发现一座豪华的地主庄园住宅陶模型，并见到我国最早的百叶窗。这些各种质料的随葬品，也是研究汉代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六）六朝至明代

六朝时期，位于今鄂州市内的武昌城是孙吴首建都城的地方，也是两晋、南朝时期武昌的郡治所在，是我国南方现存六朝古城中最早的一座。现存城址平面略作长方形，

北临长江,其余三面均有夯土城垣,并发现城门5座,城垣四角发现角楼的夯土台基,南垣外侧发现“马面”的夯土台基,城垣外设有城壕。城内采集到的黑灰色筒瓦,或许就是武昌宫的遗物^[20]。武昌城址的平面布局以及用于军事设防的角楼和“马面”等,都是中国古代都城中较早的实例,对研究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六朝时期的墓葬在全省范围内都有发现,并以武昌、鄂州两地最多。所发现的纪年墓达20座之多,具有典型的断代意义。通过对武昌和鄂州近600座中、小型墓葬资料的整理研究,建立了湖北地区六朝墓的年代学序列,并对墓葬进行分类研究,确定了墓主生前的不同等级。鄂州鄂钢饮料厂1号墓的墓主为孙吴宗室,是目前长江流域所发现规模最大、墓主身份最高的一座六朝墓。在江陵、襄阳还发现两座南朝画像砖墓,其风格特点与河南邓州所见画像砖接近。

青瓷器是六朝墓中出土数量最多,也最具时代特征的器物,主要有日常生活用器和模型明器两大类共30余种。大批的青瓷器,除少数为长江下游的产品外,绝大多数具有地方特点,应是湖北地区生产的,圆体青瓷虎子、青瓷人顶灯、蛙形水注等是其中的珍品。鄂州孙将军墓地“孙将军门楼”和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出土的青瓷坞堡等模型明器,反映了当时豪门大族府第的建筑情况。鄂州塘角头十四号墓发现的1件釉陶佛像,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佛像。过去还在武昌莲溪寺永安五年墓发现鎏金铜佛饰和4件“白毫相”俑,是研究我国早期佛教造像及佛教南传的重要资料。

六朝铜镜在湖北省各地的墓葬中都有发现,仅鄂州出土的铜镜总数即达200件以上,其中纪年镜有20余件。鄂州发现的这些铜镜,除少数为浙江会稽和吴郡的产品之外,绝大多数为武昌(今鄂州)所铸。古代武昌铸镜业发展较晚,但生产的神兽纹镜和四叶八凤纹镜颇具特色,不仅在武昌大量流行,还远销到包括会稽在内的南方各地,是当时南方的铸镜中心之一。

隋唐时期的墓葬,基本沿袭了湖北地区南朝以来的葬制和葬俗,另在三峡地区还发现一些洞室墓。隋墓中使用画像砖和花纹砖的现象更加普遍,但到唐代已较少见。武昌发现隋唐墓最多,经过对其中200余座墓葬资料的整理研究,建立了本地区隋唐墓的年代学序列,对随葬的青瓷器分窑口进行归类分析则是考古报告编写的重要突破,另外还对墓葬的类型进行了全面分析^[21]。在安陆和郢县发现等级较高的唐墓,其中郢县发掘的唐濮王李泰及其长子夫妻和次子4座墓^[22],是除唐代帝陵之外一处重要的李唐王族墓地。此处墓地的墓葬形制,具有陕西唐代贵族大墓的特点;出土精美的三彩器和工艺上乘的金银器,也是唐代长安的产品。众多隋唐墓中出土的大量炊俑、伎乐俑等,则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宋元时期考古通过对蕲春宋代罗州城的发掘,印证了此城毁于战火的文献记载。此时期湖北窑址发现较多,仅在梁子湖周围就有上百座之多。近年对江夏区青山窑和王麻窑等窑址进行了发掘,首次揭示出本地区瓷窑的特点,填补了长江中游瓷窑考古的空白。另外,在黄石西塞山发现了一座宋代钱币窖藏和一坛宋代银锭,其中钱窖内藏铜钱

22万余斤，出有自西汉初至南宋淳祐十二年之间 1400 余年的各个朝代的铜钱，为研究我国古代货币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宋代墓葬均为中、小型墓，有土坑墓、石室墓、砖室墓、室墓、洞室墓、砖石混筑墓等各种结构，在汉水中游多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三峡地区则发现一批洞室墓。各地还发现一批五代至宋代的纪年墓，具有断代意义。许多墓中还发现墓志和买地券。墓中一般出土遗物都不太丰富，大多以瓷质生活用具为主。在汉阳十里铺北宋墓中出土 19 件夹纆胎漆器，为湖北襄阳产品。

明代墓葬发现较多，已发掘明朝首辅张居正墓等一批等级较高的墓葬。在钟祥、江陵、武昌和蕲春还发现一批藩王墓，其中钟祥显陵是明世宗亲生父母兴献王朱祐杬和王妃的合葬墓，将被列为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先后发掘的楚昭王朱桢墓、江陵辽简王墓和湘献王墓，出土有大批金银器和金封册等文物，对研究明代藩王墓的葬制和葬俗具有重要意义。

三

湖北的文物考古工作起步较晚，但经过 50 年的不懈努力，已有许多驰名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并在探索人类起源和演化、聚落形态研究和楚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人们对湖北地区的古代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回顾湖北考古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感到自豪的同时又认识到任重道远，必须更加振奋精神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使湖北的考古工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达到更高的水平，为达到全面复原湖北地区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目标而奋斗。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精辟指出：“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将是世界性的中国考古学。”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走向 21 世纪的过程，也将是走向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过程。”湖北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明确 21 世纪中国考古学的方向，才能更好地搞好湖北的考古工作。

首先，要不断完善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只有在正确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我们的考古事业才能迅速地发展，湖北 50 年的考古工作实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湖北考古工作的第一、二阶段，由于忙于配合基建工程进行抢救性的田野发掘，同时缺乏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发展不快。到第三阶段，虽然也主要是配合众多的大工程进行田野发掘，但在区系类型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加强了研究工作，因而发展较快。例如新石器时代已建立起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系列，并对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类型、文化内涵与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91 年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目标，是 21 世纪考古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国内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勇于在实践中创新，并不断完

善。只有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我们才能更快地达到这个目标。

其次,要大力加强课题研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经济建设必将蓬勃发展。因此,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工作,不会是短暂的行为,而将是长期的任务。从目前情况看,21世纪湖北境内的大型建设项目非常多,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中围绕学术课题开展考古工作,也将是长期的任务。湖北地区的各个时期文化发展并不平衡,各地的学术课题也不完全一样。在配合建设工程中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选择课题,以加快考古学科的发展。湖北50年的考古工作,在课题的研究上虽然取得不少成果,但还很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旧石器时代,在鄂西、鄂西北地区虽已发现100多万年前的猿人化石,但比非洲地区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年代晚。今后必须在这些地区开展专题调查,为解决学术问题而有计划地做些主动性发掘,继续探索人类起源这个世界性的重要课题。湖北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数以万计的石制品,但缺乏研究,今后应对这些石制品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与周边地区的石制品进行对比研究。同时,还应加强对旧石器时代如何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问题的研究。新石器时代,目前城背溪文化的年代为距今七八千年,早期文化尚存在缺环,应加大寻找的力度。城背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遗存中都曾发现水稻等农作物,但年代偏晚,随着寻找早期文化工作的开展,也应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以加强农业起源课题的研究。目前湖北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较多,各个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以古城为中心的聚落形态研究工作虽已起步,但还远远不够;今后应为解决学术问题有计划地做些主动性发掘,进一步探索文明起源及湖北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建立夏、商、周王朝后,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曾对湖北的土著文化产生深刻影响,而且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还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历程,目前的考古资料已露端倪,但并不十分清楚,需要进一步做工作。商代早期的盘龙城遗址,需要进行全面的考古勘探,弄清城内布局;对城垣也需继续解剖,解决建城与沿用的年代问题;对城外要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弄清当时贵族墓地等的分布情况。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今后应对大冶、阳新的古矿冶遗址组织专题调查,并对古矿冶课题做更深入的研究。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曾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但关于曾、随关系,曾、楚关系,以及曾都在何处等问题,均需进一步探讨。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虽然已取得重要成就,但广度与深度还不够。今后应加强对早期楚文化的探索,以了解西周早、中期楚国的兴起及发展过程;对楚国春秋晚期以前的都城,也需进一步探讨。目前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考古资料积累较多,尤其是楚简、丝织品、漆器等,今后应分专题、组织多学科联合进行深入研究,达到以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重新编写楚国历史的目的。秦汉以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湖北地区应着重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在大一统的文化中的地方特点,并对较突出的课题进行研究。例如秦汉时期发现大批内容丰富的简牍,是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目前虽已进行初步研究,但还很不够,今后应加强研究的力度。湖北出土的大批精美的

秦汉漆器,以及六朝时期的武昌城、六朝佛教造像、六朝武昌铸镜、六朝与宋代瓷窑等方面的课题,均需进一步研究。随着我们的研究课题更加广泛而深入,才能达到全面恢复湖北历史的目标,也才能不断地走向世界。

第三,要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科技考古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二是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过去我们也做过一些努力,例如曾侯乙墓发掘后,曾邀请冶金、纺织、音乐、天文等方面的专家参加研究,提高了发掘报告的编写水平。在一些大遗址和墓葬的考古调查、发掘中,运用遥感、航拍等探测技术,以及各种测年技术、成分分析等;在三峡库区工程的考古发掘中采用了古 DNA 提取和研究、孢子花粉研究、古代地理研究、成分分析等,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这些工作并不全面,也不系统。21 世纪是人类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只有在田野发掘与课题研究中,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才能获得更多的历史信息,也才能实现考古学的现代化。

第四,要加强省内外的合作,努力开拓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湖北省的田野发掘和考古学研究工作,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各兄弟省市、各大专院校的大力支持。例如在楚文化研究方面,与湖南、河南、安徽三省的共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也曾多次派专业人员出国访问,并与美国、日本、法国的学术机构共同发掘遗址或开展专题研究工作。但是,目前围绕学术课题与兄弟省市开展的合作较少,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在三峡工程库区考古工作中,应与重庆市合作研究巴文化及巴、楚文化的关系。湖北位于中国中部,是南北文化交流与东西文化联系的枢纽,各个时期与周邻地区的文化关系密切,今后也应为解决这方面课题而与兄弟省市加强合作。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将走向世界,理应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使世界了解湖北,也使湖北了解世界。

第五,要加快人才培养。21 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21 世纪的湖北考古工作,同样必须依靠一支有较高水平的考古队伍。一个省级的考古研究所,必须具有各方面的研究人才。培养人才,是新世纪考古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制定人才培养规划,并采取有力措施,使各方面的人才较快成长,才能完成我们考古工作的最终目标。

第六,要切实做好大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为使中国考古学健康、持续地发展,必须切实做好各个时期大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21 世纪是我们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的世纪,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仍然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如何在经济建设中采取有力措施,将文物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也是每个考古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注 释

- [1] 贾兰坡:《长阳人化石及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古脊椎动物学报》1957 年 3 期。
- [2] 李天元:《曲远河口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 年。
- [3]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2 月